

刘彬徽、著 岳麓书社

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

目 录

炎黄文化的考古学思考·····	(1)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问题·····	(4)
略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的文明·····	(8)
中国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15)
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	(20)
试论楚国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	(26)
楚郢都建制考·····	(38)
江陵望山沙冢楚墓论述·····	(46)
从近年出土曾器看楚文化对曾国的影响·····	(60)
随州擂鼓墩战国墓群概说·····	(65)
包山大冢——又一座楚文化地下宝库·····	(67)
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	(74)
楚系铜器略论·····	(87)
楚铜器墓分期续论·····	(95)
曾侯乙墓青铜礼器研究·····	(104)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初论·····	(112)
东周时期青铜敦研究·····	(115)
论东周青铜缶·····	(123)
两广地区青铜容器研究·····	(129)
秦楚青铜器比较研究·····	(133)
吴越地区东周青铜器与徐楚青铜器比较研究·····	(138)
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	(147)
金文试释二则·····	(158)
湖北出土两周金文补记·····	(162)
楚系文字志·····	(172)
包山楚简论述·····	(178)
从包山楚简材料论及楚国纪年与楚历·····	(189)
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	190

包山楚简研究二则	(206)
常德夕阳坡楚简考释	(215)
楚帛书出土五十周年纪论	(219)
楚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与研究	(224)
关于郭店楚简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232)
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周制的关系	(239)
楚国彩绘木雕屏初考	(248)
楚兵器研究一则	(252)
楚辞与楚文物	(256)
关于杞国历史地理问题的探讨	(262)
关于先秦汉初袍服的定名问题	(265)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	(268)
附 录	(276)
后 记	(281)

炎黄文化的考古学思考

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与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方面正日益发挥其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之,炎黄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当今莘莘学子的热门话题。

众所周知,说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炎黄苗裔者,即共同承认炎、黄两帝为中华人文共祖。炎黄两帝的时代乃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传说时代的两大英雄人物,正由于出现于传说时代,对这两帝的原居地、出生地及主要活动地域的说法迄无定说,若纯粹从文献记载来探讨,均各有所据,可以各持一辞,谁也说服不了谁。好在当今已有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可证文献记载之误或不确。因此,我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已发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作出超越于前人的更为科学的解释。这对增进炎黄子孙的共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使海内外同胞更加同心协力地振兴中华,大有好处。

一

我们的分析还应先简要地梳理一下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文字记录。

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是最为可靠的。铜器铭文中在齐威王(公元前 378—343 年)的一件敦上有祭祀“高祖黄帝”的文字,证明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黄帝为其始祖的。而在南方楚文化区,于 1942 年出土的时代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的长沙楚帛书上则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等语;在《山海经·海内经》有炎帝直系子孙“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等语;又有《楚辞·远游》“指炎神(指炎帝神居处)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等句。由此可见,炎帝、祝融被视为南方民族(其后有楚族)之始祖,应该是信而有证的。一北一南、一黄一炎,泾渭分明。古籍上也有类似记载,如《绎史》卷五引《新书》云:炎黄二帝“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各半,并不是东西两半,而是南北两半。这从以后的以青帝配东方、白帝配西方、炎帝配南方、颛顼配北方的记载也可得到佐证。这正好与中华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二元耦合组成的传统相合。说炎帝文化为我国南方地区文化始源当毫不过分。诚然,炎帝及其文化究属南方抑或北方,自古以来争论颇多。数十年以前,蒙文通、傅斯年先生力主炎帝集团属于南方,而徐旭生先生则力主属于北方^①。双方均为一代国学大师,各持之有据。现时已有众多考古资料予以再研讨。笔者以为据新的资料可以进一步论证蒙、傅大师的看法是可取的。

二

《史记·五帝本纪》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并没有炎帝的地位。这大概正如五帝本记所云:“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法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乃失败者,自不应引入五帝之中。但这里却透露了历史的真相,即炎帝乃是足以与

黄帝抗衡的一大部落之首领。这个部落地域非东非西,而在南域。前面已指出炎帝确乎是南方的部落首领。他有如此大的势力敢与黄帝抗衡,正是在南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强大部族及其首领。

黄、炎两族的时代,据严文明先生的看法,大致相当于我国原始社会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 3500 年至 2600 年;在黄河流域为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长江流域则为大溪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时期。^②

关于此时期南北文化的关系与势力消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早已有论断:“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又说“在此期间内,我国民族文化关系上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以东南方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③对于这一论证笔者深信不疑,早在 1985 年笔者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时就已举例说明:“我们也应看到南方地区原始文化对北方的影响,如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它向北影响所及,已深入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腹心地带,在禹县、郑州等地的仰韶文化区都可找到它的踪迹,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出土的绳纹大陶锅,就与屈家岭文化的大陶锅相似,出土的敛口钵上的圆形旋涡纹饰与仰韶文化彩陶风格异趣,而具有屈家岭文化特点;在禹县出土了折腹豆、高领圈足盘、高圈足杯、宽扁瓦状鼎足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④这些屈家岭文化遗物发现于黄河流域(直到黄河岸边)说明什么问题?这只能证明屈家岭文化(即炎帝文化)发展水平丝毫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甚至还要略胜一筹,否则不会对之有如此大的影响;不难推测出当时的屈家岭部族(炎帝族)的人们已向北发展其势力,这或许正是《史记》所云“炎帝欲侵陵诸侯”的遗迹与物证。对于这方面的论述,新近出版的张绪球著《长沙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一书也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在此不烦再引,然他的结论性看法仍是继续发挥、印证苏秉琦先生的论断:“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之间都已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总的趋势是,长江中游对外的影响远远大于外界对它的影响。因此,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曾经在全国的范围内,发挥了数百年的龙头作用,这是江汉地区先民们对祖国历史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⑤前面已指出,炎帝族氏从时代上看,正好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此观之,我们应充分重新估价作为南方原始文化表率的炎帝文化的伟大作用。由于历史上中原文化正统论的长期影响,几千年来不被重视的南方文化首先是由于楚文化考古的重新发现而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种对南方文化的不公正的看法。同样地,由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新发现,也迫使人们需要改变几千年来对炎帝及其文化的不正确、不公正的看法与评价。正是由于这种背景,近年湖北随州有炎帝文化的讨论会,湖南有炎帝陵的重新评估与研究,对澧县城头山屈家岭城址的探究^⑥……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势所必然。中华文化的本源正是南炎北黄的二元耦合而成,在当今南方地区经济正在腾飞之际,大力弘扬南方炎帝文化的创业精神,必将产生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与辐射作用,吸引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使这半壁江山重振雄风,发挥其龙头作用。这样,中华巨龙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将是指日可待。

注 释

①蒙、傅和徐先生之说参阅徐旭生先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炎帝是否属于南方集团”一节(文物出版

社 1985 年版第 121 页)。

②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 年第 1 期。说屈家岭文化为炎帝文化,两者时代基本相符。

③《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7 页。

④这一讲演稿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85 年 5 月 23 日。标题为《中国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⑤此书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引文见第 33 页。此书第 316 页说“炎帝又称神农氏”,或径称炎帝神农氏,这是不确切的。神农氏乃传说中的“三皇”之一,而炎帝则与五帝之首的黄帝同时,关于这一点,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早已指出:“炎帝绝不是神农。”有的研究者也忽视此点。

⑥参阅拙作《炎帝族氏遗迹的新发现》,刊《楚风》1993 年第 2 期。

(原载《炎帝与中华文化》一书,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问题

中国文明的起源已成为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近年来形成了研究热潮。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重要地区之一,由于近些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这一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并予以高度的评估。但也无庸讳言,至今仍存在忽视或贬低的情况。作为置身于本地区的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既为一些重要的新发现欢欣鼓舞,也对出现的忽视与低估的现象,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参与讨论,予以辩明。以下试举数例,略作评议。

1993年出版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①,在其第八章“黄河文明的伙伴”中只提出“太湖地区古代文明”、“燕山地区古代文明”这两个再无第三个“伙伴”。在该书的概论里,除提到黄河文明、太湖文明、燕山文明这三者外,甚而还提到石峡文化、巴蜀文化“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却不提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文化,这就表明在该书作者眼中,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如石峡文化,更谈不上作“黄河文明的伙伴”了!这很使人纳闷,不知是该书作者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视而不见还是有意贬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妨再举一例。

1994年发表的《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以下简称《异同》)一文^②,对处于同一时代的中原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作出了贬低石家河文化的论述:“在社会性质方面,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均处于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酋邦阶段。石家河文化的社会,也到了部落社会的晚期。”即是说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落后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该文作者在此文中又说:“笔者以为良渚文化已经达到了文明的前夜,创造了酋邦组织,石家河文化则可能还处于村社为基础的部落社会的晚期”,即是说,石家河文化连文明的前夜都还未达到。这样低估石家河文化发展水平,颇令人吃惊。此文作者一向重视考古材料,像城头山古城发掘材料也已有简报发表^③,石家河文化其他重要新发现也陆续有报导,为什么还持此看法?!由此看来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石家河文化的研究,不仅是要深入一步,还要大力宣扬,让学术界充分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石家河文化的发展水平,是不是如《异同》所说的落后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在我们看来,这应已不成为问题,应该说多数研究者都已指出石家河文化可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并驾齐驱,并且还有自身的特色。这一特色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全国年代最早、规模又最大的古城——城头山古城、石家河古城等。城头山古城已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解剖了城垣并取得了碳-14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④。而中原地区的古城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晚于城头山古城;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同一时代全国古城中面积最大者;黄河中下游地区古城以城子崖古城最大,其面积仅70万平方米,比石家河古城小得多。城邑的出现是文明的重要成果与标志,即此一项已足以表明石家河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长江中游地区这样的古城已发现五座,对这些古城如何认识?现有的认识并不一致。1994年发表的《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一文^⑤,对其中关键问题的看法笔者难以苟同,这就是古城的年代(含使用年代)和性质问题。这些古城的兴建年代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这大概众无异辞,问题在其下限年代,即使用了多长的历史时期?早在此文发表之前一年,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一文的发表^⑥。此调查报告云:“石家河城的建造年代较晚于屈家岭文化的起始年代,是在屈家岭文化在当地经过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以后开始兴建的,也许比较妥当。在黄家岭和邓家湾遗址,我们皆见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地层迭压了城墙内侧斜坡面的钻探资料;在三房湾东台,我们还找到最富这一时期特征的红陶杯堆积层迭压城墙内侧壁的地层剖面。这一时期是当地文化最繁荣的阶段……这些情况表明,石家河文化早期是使用这座城垣的主要时期”。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引述了该报告这一大段话,用以证明石家河古城决不仅是一座屈家岭文化古城,准确地说应是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两个时期的古城。(至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此古城的情况,那是另一问题,与我们讨论文明起源关系较次,暂不论)。同样,其他古城与石家河古城一样,也应使用、延续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头山古城“最兴盛为石家河文化时期……在湖北石首走马岭也发现了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继续使用的城址”^⑦。

这样,《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一文将那些古城全部断为“屈家岭文化古城”显然不妥,此文进而认为:“屈家岭文化古城和(中原)龙山文化古城在社会属性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屈家岭文化古城的社会属性为军事民主制”。对年代范围推断不确则进而所作此推论,也就值得推敲了。这些古城使用的繁荣期在石家河文化时期,与中原龙山文化古城年代相近,社会发展水平也大体相同,说它与中原龙山文化古城“有着根本的区别”,显系言过其实。说“屈家岭文化古城的社会属性为军事民主制”也就值得进一步讨论了。

长江中游地区这些古城与黄河中下游古城大体处于同一时代,其社会属性如何?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如严文明先生指出的,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大体上处于军事民主时期,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边缘;一种认为已属早期青铜文化,并已进入文明时代”^⑧。

对这样重要的文明起源问题,之所以见仁见智,未能共识,既有对文明探讨的理论上的认识问题,也有对已发现的大量丰富而重要的考古材料如何科学地整理、认识的问题,也还有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的期待。因之,目前要强使大家接受一种看法,是不现实的。

就笔者现有的认识,如果要在上述两种看法中择其一,则我赞成后一种说法,即在这一古城时代^⑨,已跨入文明门槛,其主要标志就在于有列城林立的古城,像石家河城、城头山城等应是我国传说的五帝时代“以建万国”的众多古国之一^⑩。其中石家河城是目前所知龙山时代我国最大的古城,在城内已发现大面积的房屋建筑基址(有的房屋墙体厚度达1米),在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发现许多塔形陶器,估计是宗教用品,有几处用大黄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其中有些陶缸上有刻划符号,估计也与宗教活动有关;有两个灰坑内出土了几千件陶塑动物,还有成百件人抱鱼象,这显然是一处宗教活动中心。城内还有专业化的陶器生产地点,在一处发现的红陶杯,其数量可能有数十万件之巨,制作粗糙,不是实用器,属于礼仪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礼器。有如此丰富内涵的城址,表明它已不仅仅是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而具有经济中心、社会权力中心等多种功能,是“城市革命”、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⑪。当前人们通常以城的出现作为中国文明产生的三个基本要素中的第一个,从这点看,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速度与水平丝毫不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并且处于领先地

位。

其次,作为文明产生的第二要素的青铜器或金属冶炼技术,也已有所发现。在石家河城内邓家湾发现有铜块、孔雀石,在城东南附近的罗家柏岭出土有铜器残件,还出有锈蚀的铜渣,经鉴定,出土玉器的制作工具已用砣,系小型青铜工具^⑥。“在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刻有十分规整的仿铜器的云雷纹陶片;在随州西花园出土的一件红陶小杯上也发现了规整的云雷纹。这些现象,透露出石家河文化已有了铜器铸造工艺,至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⑦。从这点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水平也应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不相上下。

第三,作为中国文明诞生的第三要素的文字,目前各地还只发现了一些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刻划符号,对其性质仍在讨论;丁公龙山陶文是一重要新发现,但目前仍有争议。长江中游地区早在大溪文化时期如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里就发现大量刻划符号,有的符号竟与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处,令人感到惊奇,显示出“比仰韶文化的陶文更具‘意识’,更为进化”^⑧。那么,晚于大溪文化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定有更为进化的文字符号,这应是合理的推论,只是至今尚未发现罢了。

除以上三个基本要素之外,在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工艺技术的成就、社会的分化与改组、阶级分化与权力阶层的形成等方面都已显示出一个总的图景,表明长江中游地区以这些古城为中心,在石家河文化的兴盛时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均已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已超越了“军事民主制”的社会阶段,而“步入初级文明”时代或“最早的文明社会”,依笔者之见,或可称之为进入“文明的初级阶段”^⑨。

自然,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在这一小文里不可能详细陈述。如前已提到的,本文主要是对《异同》一类低估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发展水平的倾向略作必要的分析与评论,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把长江中游地区在我国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淋漓尽致地予以揭示出来,共同为我国早期文明史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 释

- ①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②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 ③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此城址在1992年3月即已报导并列入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4年冬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掘,收获甚丰。
- ⑤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 ⑥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 ⑦⑧何介钧:《石家河文化浅析》,《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 ⑨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出处同上注。
- ⑩笔者主张使用“古城时代”的名称,更切合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发现的实际,而所谓“玉器时代”的名称则不妥。
- ⑪五帝时代已是列城林立的古城古国时代,这有大量文献记载,在此不论列。
- ⑫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1892~1957)所著《远古文化史》中就已提出“城市革命”的概念,认为是

文明出现的标志与里程碑,《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有《中国先秦城市发展史概述》一文,对这一时期古城发展水平与性质的看法则反而值得商讨。

⑫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⑬林小安:《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3期,中华书局,1993年。

⑭“初级文明”、“最早的文明社会”,这是严文明先生的提法。我提出“文明的初级阶段”,意在强调文明初创时期的阶段性,必要时当再论述。在此顺便强调一点,即在谈论文明起源问题时要注意文明起源、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江中游地区范围大,各个小区域发展亦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江汉平原中心地带和洞庭平原西北侧,首先形成了文明起源的中心,而周围地区则发展缓慢。在阐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原载《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略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的文明

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的文明状况,史籍记载几乎空缺,惟赖考古发现方能有所了解。近二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虽已逐渐填补这一时段文明状况的某些空白,然相对于此地区其前的史前时代与其后的两周时代而言,则又甚感考古材料的严重不足。这种前后两段材料较多而中间这一段材料较少的情况,使得研究工作既喜又忧,喜的是可对这些从地下博物馆取来的新材料,得出一些前人无从作出的新认识;忧的是毕竟材料有限,大大影响了人们的认识,以致对不少问题歧见纷生,莫衷一是。考虑到这个时期对于探讨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和楚文化渊源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微观、宏观的研讨,以求对这一地区早期文明发展有更准确的估价。

对这一地区夏商时代文明状况及其估价需作纵向分段考察与横向对比考察。

先讨论夏王朝时期的文明状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夏王朝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夏王朝是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在中原地区之外的长江流域(包括中游)地区是否也同时迈入文明时代?

我们曾经指出,这一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即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期已出现了文明曙光和进入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②。问题在于夏王朝开国之君大禹把这一地区的三苗族打败以后,这一地区的文明是“中断了”还是在夏王朝势力影响下而继续前进了?有论者认为直至西周初年“楚建国以前,当地并没有出现先进的政治组织和文明”^③,按这种观点,这一地区夏商时期无文明可言,那么,本文的探讨便是无的放矢,多此一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是从分析已有考古材料入手。

处于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支流丹江下游的淅川县下王岗遗址^④,在石家河文化层之上叠压有二里头文化一、三期的遗存,有房基、灰坑、瓮棺葬,少数灰坑有人殉现象;出土遗物中有铜制工具和玉戈等,所出陶器如鸡冠形釜扁足鼎等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相似。有学者将此遗址文化属性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下王岗类型”^⑤。遗址中发现人殉,表明阶级分化与斗争之尖锐;青铜工具乃青铜文明之证,玉戈则表明已存在礼仪活动等文明要素。因此,这一处于长江中游地区北部边缘地带,最早接受了中原夏王朝文明,夏文明向南传播与影响,大概正是通过丹江、汉水流域而逐渐南移的。从鄂东黄陂盘龙城、鄂西江陵荆南寺、宜昌白庙的发现,看出夏王朝时期文明之花已在长江沿岸地区盛开着。

黄陂盘龙城遗址有上下两类文化堆积,已发掘的为上层商代二里岗期文化,故此遗址以二里岗期商文化著称^⑥。在二里岗期之下叠压有相当二里头文化期的遗存:在城垣基部之下和南城垣外的王家嘴下层,发现有房屋建筑遗迹,文化层堆积厚可达1米;在王家嘴,发掘者判断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⑦。由于这里也出有二里头遗址同类器,表明这里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文化属性究应是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展的一个类型抑或是本地原有文化发展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一支地方文化?由于未对遗址全面揭露,难作结论。从已揭出的手工业作坊遗迹(有可能是制陶或制铜)看,手工业的专门化与铜器制造,均是文明

要素,说它在夏王朝时期已步入了文明社会,应当是可信的。

鄂西的江陵荆南寺遗址^⑧,已揭露的主要为商代二里岗期的遗存,在其下层发现有相当二里头文化二、四期的灰坑与地层,出土了与二里头遗址类似的陶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文明发展的物证,但已表明此地亦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

在鄂西三峡地区宜昌的白庙、路家河、宜都红花套、毛溪套等地,发现了相当中原夏王朝时期二里头文化的一类遗存^⑨,其中以白庙遗存内涵最丰富而典型,研究者称之为“白庙类型”,认为这是在二里头文化强烈影响之下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一支新的文化类型^⑩。

这一地区长江沿岸从东至西几个地点的新发现,具有改写夏史的重要意义。夏王朝的势力已到达长江沿岸,这是考古材料所给予我们的崭新的认识,表明了夏王朝文明已在长江沿岸生根、开花^⑪。虽然在荆南寺和三峡地区能证明文明情况的考古材料尚属欠缺,考古工作有待加强。当然也要估计到鄂西此期的文明发展程度低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其他地点(如盘龙城)。

由于考古发现实在太少,关于这一地区夏王朝时期文明状况只能作出这样的估价:在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以后,这一地区缓慢地或先或后地进入了文明时期。文明的特点是本地原有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由点到面,也许终夏王朝之世仅是一些散点式的文明,即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特点可能一直延缓到商王朝时期。我们在此所要否定的是如前面提到的这一地区无文明的言论,即算是星点式的文明,也应承认这一地区已存在着文明,下王岗遗址、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夏王朝时期由于考古工作太少,材料有限,那商王朝时期的考古发现更能证明其文明发展水平与特色,因而有必要着重分析一下商王朝时期的考古材料。

这一地区商王朝时期文明状况可分早晚两段来考察。其早段遗存有盘龙城遗址、荆南寺遗址、湖南铜鼓山遗址和石门皂市遗址等,重点考察盘龙城遗存。

盘龙城的二里岗期商代遗存,曾先后三次进行发掘,获得了足以说明这里文明状况的丰富资料^⑫。主要有:1. 保存较好的方形城址,面积7.54万平方米,城垣残存高度最高达7—8米,城垣外有濠沟围绕。2. 城内东北部有大型宫殿遗址,在宽广的台基上前后分布三座宫殿基址,已揭露两座,一座为中间有四室,周围有回廊的大型建筑,另一座则为有大空间的厅堂。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前朝后寝”宫室建筑实例。3. 城外有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作坊区。4. 发掘了三十多座不同等级的墓葬,其中以李家嘴二号墓规模最大,随葬青铜器最多,并有殉葬奴隶,极可能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之墓。5. 遗址与墓葬内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等,是了解这里文明状况的极好实物资料。

盘龙城的高峻的城墙昭示着这里“已经耸入文明时代”^⑬。目前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商代前期的城只有三座,即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这座盘龙城,前二城均为商之都城,而盘龙城则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座商城。盘龙城乃仅次于商都的有较高文明发展水平的一个地方文明中心,这一点应是无异辞的了。

这样一个地方文明中心,由于它与中原地区二里岗类型商文化的相似性,一般都将它归“属商文化系统”^⑭。是否如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究。即使它属于商文化系统,还可追问:这个处于商王朝南土范围的文明中心的出现,是中原商代文明的移植?抑或是受到中原商文明强烈影响下的本土文明?若对其文化内涵作点动态分析、量值分析,是不难作出恰当的判断的。

首先,盘龙城商文明的出现是以本土原有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前面已提到盘龙城商文化层叠压着本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时期文化的遗存,其中以陶器的因袭关系最清楚,例如此地二里岗期高领平裆鬲、小口罐、折肩瓮、红陶敞口罐等,都是由下层同类器演变而来,并可在早于二里头期的石家河文化中找到其演变的源头,这种源流关系必须肯定。

其次,从中原商文化对盘龙城的影响看,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少到多的演变过程。论者将盘龙城二里岗期墓葬分为四期^⑩。第一期陶器的文化因素以本地原居文化占上风,表明盘龙城的先民仍沿袭旧习,或者是北来的商人改从当地习俗;到第二、三期,商文化因素不断上升,至最后一期(第四期)变成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导。如陶鬲,部分与中原二里岗的几乎雷同,商化程度很高。但即使如此,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本土自身特色。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这里的陶器“不论是原有的或外来的,都经过了本地的改造”^⑪。例如陶鬲,本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在这里,属于经改造的融合型陶鬲,占出土陶鬲总数的70%。而胎质多作红陶以及数量庞大的红陶方格纹缸更是与中原的泾渭分明,特色突出。这种自身特色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例如建筑上的木骨泥墙、器类上多见青铜工具和纹饰中的人字纹、菱形纹等,均为不见于中原商文化的本土特色。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已不难看出,这里的文明显非中原商文明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原与本土两者的融合。若一定要说它属于商文化系统,也只能是在一定阶段即盘龙城墓葬第四期处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才可以如此说。不过正如前面所言,即使在此阶段,其本土特色仍是一目了然的。盘龙城文明显然是在本地相当二里头阶段即夏王朝时期文明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中原商文明而最终形成。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受到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中原二里岗商文明的强烈影响,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在长江中游地区处于发展前列的文明中心。

据此分析,盘龙城商文明的创造者显然既有本地原居族群也有北来的商族之人。那末,其上层贵族和最高统治者是谁?是商人抑或本地原居民的首领?和前面提到的问题一样,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1.“是商人在长江之滨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⑫。2.“是作为商王朝的一个侯伯的军事据点”,并认为此据点的统治者即卜辞中多次提到商贵族“雀”^⑬。3.“盘龙城是‘荆楚’的都邑”^⑭，“有可能正是商代楚国的都邑”^⑮。

这几种看法多有所据,偏重于商文化为主导因素便主张第一、二两说,至于第三论证为楚国都邑,乃仅据这里有本土文化因素而作的一种推测。楚国立国于周初,地在鄂西,此前的情况不明,无法推测。在此,笔者提出不同于以上三说的第四种说法——这里是荆楚地区长期在盘龙城一带生息的族群建立起来的一个方国(即既非第一、二说之国,也非第三说之国)。这个方国也许早在夏王朝时期即已建立,到汤灭夏以后则归服于商。这种推测的依据是:

第一,考古证据。即前面提到的盘龙城文明是在本地原有文化发展基础上接受了中原商文明强烈影响而形成的。

第二,文献依据。据《吕氏春秋·异用》:“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又据《越绝书·吴内传》:“汤献牛荆伯。伯者,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伯也”。这种记载与《史记·夏本纪》记夏末“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的记载相合。又有《诗经·商颂·殷武》:“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城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看来,商王朝建立后四周大小方国多已归顺商朝,应是事实。盘龙城这个方国归服商王朝,接受比自身文明更高的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乃顺理成章的

事,也可更好理解考古材料反映的商文化因素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演变进程。

至于这个方国当时叫什么名称?是何族群?与周初立国的楚国有无关系?苦无材料予以确说。大概说来,这当是荆楚地区一支土著部族建立的方国,这个方国仅是荆楚地区几十个方国之一。周初的楚国在商代也许亦是这几十个方国之一。没有过硬的材料,不可贸然把盘龙城这个方国与西周兴起的楚国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顶多只能说在商代,盘龙城方国与日后兴起的楚国曾经有某种联系,甚至也可以认为盘龙城方国衰亡以后,它的一部分居民包括其统治者中的一些人也许加入到了建立楚国的行列中去了。

考古材料显示,盘龙城的最盛期在二里岗上层期,到殷墟一期时衰败。关于它衰败的原因,由于前面提到的对其性质判断不同,也有多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由于盘龙城这一商王朝封国或军事据点统治者对当地的残暴压迫与掠夺,引起荆楚地区土著部族的反抗,打破了这个城池,使城毁人亡,从此成为废墟,即毁于一场战争^⑤。毁于战争之说有一定依据,但值得研究的是毁于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如果按前面笔者提出的这是当地土著部族建立的方国并且是从商汤以来一直归服商王朝的方国,如此推论,就可得到一个新看法:这一土著方国在长期接受先进的中原商文明过程中,力量不断壮大,待羽翼丰满时,它不再俯首听命于商王朝的指挥了,不再充当商王朝向南掠夺、统治的马前卒与桥头堡了,而要闹独立了,进而成为商王朝的对抗力量,甚至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类似情况,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足为怪。约当殷墟一期,正是商王朝中衰之时,史载商王阳甲时荆楚反叛,其时正是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偏晚,盘龙城方国势力最盛之时。商王朝中衰,对荆楚之反叛也无可奈何,只有等到武丁之时商王朝中兴,才可能大举向南讨伐荆楚地区的叛乱。武丁时“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族,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诗·商颂·殷武》)。《诗经》这首诗乃春秋时代宋国的宗庙祭祀诗,曾有人怀疑其所述史实的真实性,但已有甲骨文可证,论者已引述甲骨原文,指出武丁确曾亲率大军(甲文有左、中、右三军),在三个方国(曾、我、举)的配合下讨伐荆楚地区反叛势力^⑥。看来,武丁时曾与荆楚地区的众多方国发生一场大战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在荆楚地区能与武丁强大军事力量抗衡的决非等闲之辈,一定存在着以某一强大方国为首的对抗势力。而现在我们所知唯有盘龙城这个方国是当时荆楚地区文明发达水平最高的一个,能与武丁对抗的方国看来非此莫属。自然,它毕竟是一个地方方国,它决然不可能在武丁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下取胜,决定它的历史命运的只能是以失败告终。这当是盘龙城废弃的真实原因。当然,这仅是一种有根据的新思考,特予揭示,立此存照。

就现有考古材料而言,商代二里岗期,在长江中游地区确以盘龙城文明发展水平最高,由于它是本土文明之代表,势必对其他地区广为辐射,产生重大影响,并且通过这一中心的扩散,把中原商文明的先进因素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也向周围其他地区扩散,例如向西已达江陵荆南寺,向南有岳阳铜鼓山遗址,以至远在湘西北的皂市遗址,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铸铜遗址^⑦。这些地点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中原商文明刺激影响下,本地区的文明进程大大前进了一步。那种所谓直到周初楚建国以前这一地区尚无文明可言的论调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诚然,这一地区商早期文明据考古材料仍只有几个孤立的点,这也如夏王朝时期一样,是发展不平衡所致。并且这也受考古发现局限性所制约,将来也许能发现更多的点。与夏王朝时期相比,这一地区的文明从空间上来说已推进到江南,在湖南洞庭平原从东到西都已存在着文明,文明发展水平也比夏王朝时期更为提高。限于篇幅,对盘龙城以外同期遗存的文明状况和特点不再详论,而多留点篇幅讨论一下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这一地区的文明状况。

在商代晚期,盘龙城文明已不存在了。那么,在这一地区还存不存在另外的文明中心?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还找不到如盘龙城既有城墙、宫殿又有手工业作坊、贵族墓地这样的文明中心,但较为发展的文明地点还是有的。其中有两个地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个地点在江汉平原西南侧的江陵、沙市、松滋之间。已在江陵梅槐桥、沙市周梁玉桥、官堤、松滋博宇山等地发掘出相当殷墟期的遗址^③。在江陵、沙市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尊、罍^④。上述遗址内涵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只有极少量的中原商文化因素,这与盘龙城二里岗上层期恰成反比。表面上是本土文化复归,商文化的后退,实质上商文化已融入本土文化中,从文明发展看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最明显的例证是出土的青铜器如尊、罍,与中原同期之器相比,决不稍逊一筹,而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在第二个地点更是如此),并且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无疑是本地自铸的青铜器,表明本地青铜文明水平决不亚于中原地区。虽然在这一地带尚未发现城址与手工业作坊区,但不能就此作出否定的结论。今后能否找得到?只有寄希望于将来的考古工作。

第二个地点在洞庭平原东南侧的以宁乡黄材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带。已在黄材、岳阳对门山、费家河发现商代殷墟期遗址^⑤。以黄材为中心出土的同期青铜器已达二百余件,占湖南全省各地出土商代青铜器总数的90%。这里不仅数量多,而且多重器和精美之器,如重达221.5公斤的大铙,乃我国最大最重的铙,有“铙王”之称,不仅有“铙王”,并且还有多达9件的编铙(9件为一套,乃第一次发现),有“铙王”之称的大铙和象纹铙、人面纹鼎均已列为国宝级稀世珍宝^⑥。

这些青铜器除极少量的可能为中原输入以外,绝大多数应为本地铸造。其依据不仅在于其形制、纹饰有地方文化因素,在铸造技术与合金成分方面也已显示出来,就连标有“戈”字族徽的铜卣,其成分中也含有南方铜器中才有的铋^⑦。众所周知,“戈”族乃中原商族,看来这支商族的一部分人已南下到宁乡一带定居,并在本地铸了标志自身族徽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先进的青铜技术在本地生根、开花,才形成了本地青铜文化的大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带成为商代晚期的又一文明中心。

由此,我们看到在商代,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中心经历了一次转移,即由早期的盘龙城文明中心向西转移到今荆沙一带和向南转移到今宁乡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一带,扩大了范围,出现了两个文明中心地带。这进一步表明在商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发展比之商代早期又前进了一大步。当然就目前材料看,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发现同时期的城址和大型墓葬,未能像东邻的新干大洋洲商墓和西边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的青铜器那样有集中而大批的出土。但可以预言,今后在荆沙一带和宁乡一线可能会有更为重大的可与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媲美的新发现!这不会是非份的妄想,而是以现有的考古材料为依据的恰当的推测。为加强这一推测的力度,不妨再讨论一下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

这种联系在青铜器方面有不少例证。先将其与大洋洲铜器作点比较。南方青铜器在晚商时期颇为流行鱼带纹、四瓣目纹和云雷纹为主纹的作风,均同见于新干大洋洲和荆沙、宁乡一带的铜器。大洋洲的一件铜鬲和在湖南出土的一件铜鬲非常接近,“因此,这件鬲有可能系自湖南一带传入,或者是受到了该地区的影响”^⑧。中原商文明之传入赣中地区,路线之一可能是沿湘江而上再东入赣中地带,湘江下游宁乡、岳阳一带是这一路线的中转站。从上述两地青铜器的一些共性,说宁乡一带为商晚期文明中心之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商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与巴蜀地区的文化联系也可从两地所出青铜器作些比较。例如广

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四牛尊、三羊尊,肩上装饰四个牛首和八只伏鸟。尊的花纹和扉棱均是三个单位,而肩上的牛、鸟却是四个单位,很是奇特,两件尊的圈足都很高,足壁的中心向外膨出,是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两件尊与中原殷墟有较大差异,而与这一地区的同类器风格相近。例如这一地区的尊、罍上的牛、鸟、扉棱、饕餮纹与前述三星堆的均相似。这里的饕餮的面,眉目口鼻的布局,和三星堆的青铜人面很有相当之处,值得注意。三星堆二号坑的尊、罍,出土时器表多涂朱,器内装有玉器、工具、铜饰之类物品。青铜容器中贮放玉器、小件的情形,也是湖南出土青铜容器中早已发现的特点之一。这种现象,肯定是一种共通的礼仪信仰的遗存。据此,可以想象得出,长江中游地区特点是宁乡一带与千里之遥的三星堆青铜器当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对此,不妨引述一下李学勤先生的论断:“自湖北、湖南通向四川,则必沿江穿过三峡。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的安徽一隅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通向四川的途径是畅通的,商文化的影响可以迅速地传入成都平原,特别是四川、两湖一带,关系密切。这对古史研究,应当有重要意义”^①。在这里较长地引述李先生的看法,在于这是通过对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两地区青铜器的相似性所得到的一种崭新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长沙中游地区商时期文化对东西两相邻地区的巨大影响,以致必须对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文明予以重新估价。在此不妨还可看看这一地区在沟通中原商文明与岭南沿海文化之中的作用。在香港 94 年举行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香港南丫岛出土牙璋进行讨论,研究者肯定牙璋这种玉质礼仪用器乃中原商文化南传的物证,并指出是以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湖南地区为重要中介地区进行的。早在新石器时代,起源于洞庭湖区的白陶就已南传珠江口地带,到了商代,青铜器、牙璋等玉器主要沿湘江、资水上行而传入两广以至更南的香港、越南北部^②。表明了长江中游地区不但发展起了本地区的文明,且起着向南传播与扩散文明的桥梁作用。

我们说要对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文明重新估计,主要是针对以往直至近年的论著仍无视这一地区存在着一定发展水平的文明而言,我们要恰当地予以估价,既不要贬低,也不要拔高。它与中原地区商文明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主要在于:第一,总体水平不及中原地区,第二,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即有的地点高,有的地点很低,甚至有的还未跨入文明门槛。并且不像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商王权之下。在这一地区可能正如文献所云“汉南四十国”那样存在互不统属的大小方国,影响了其文明进展步伐。这一地区夏商时代文明有自身特色,即使像盘龙城二里岗期上层偏晚时已高度商化,仍然存在地方特色的文明因素,商代晚期更是以地方文明因素为主,不但本地区文明在缓慢地向前推进,而且对东、南、西邻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应是我们对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明所作的恰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③,希望能有助于澄清一些不同的认识,有助于正确估价这一地区的早期文明。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拙作:《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问题》,湖南省考古学会 1995 年 6 月召开的年会论文,刊《南方文物》1996 年 2 期(见本书 4—7 页)。

③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新华文摘》1994

年第 11 期转载。

-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⑤李龙章:《下王岗晚二期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88 年第 7 期。
- ⑥⑫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 1974 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 年第 2 期。
- ⑦⑬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 ⑧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8 期。
- ⑨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 年第 2 期。
- ⑩孟华平:《白庙早期遗存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4 年第 1 期。
- ⑪邹衡先生在其著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已谈到:夏王朝时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已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夏文化分布范围,其南可达川东鄂西交界之处”。
- 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162 页。
- ⑭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362 页,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 ⑮⑯陈贤一:《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墓葬陶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 ⑰高大伦:《谈盘龙城的性质与作用》,《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
- ⑱陈旭:《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
- ⑲陈树祥:《试析盘龙城的兴衰》,《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 1987 年。
- ⑳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 年第 2 期。
- 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 年第 2 期。
- ㉒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 9 期。
沙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10 集。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博宇山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10 集。
- ㉓王从礼:《记江陵岑河庙兴八姑台出土商代铜尊》,《文物》1993 年第 8 期。
彭锦华:《沙市郊区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 年第 4 期。
- ㉔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遗址和铜器》,《考古》1963 年第 12 期。
《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考古》1985 年第 1 期。
岳阳文物工作队:《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 6 集,《求索》增刊 1991 年。
- ㉕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国宝级。
- ㉖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辨》,《求索》1981 年第 2 期。
- ㉗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 ㉘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 年 7 月 21 日。
- ㉙裴安平:《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与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㉚本人正在撰写的《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一书(为《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之一,江苏教育出版社待出版)中有专章予以详论。

(原载《长江文化论集》第一辑——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